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重建

李 长 泰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中华民族主体性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主体性重建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主体性在古代的强大是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特征的中国历史呈现,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近代困境是中国呼唤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意识的客观原因,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现代追寻是中国接纳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精神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回归和振兴的伟大实践,新时代深化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在中国的实践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伟大重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推动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回归、振兴和重建。新时代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重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主体性重建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2-0005-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201

民族的主体性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哲学上的主体性指的是人的目的性、独立性、自主性和实践性,是指作为主体人的实践活动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质;民族的主体性指的是民族主体地位的性质,是民族性、独立性、主动性和本根性,是作为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所具有的独立的实践活动的特征和性质。中华民族主体性既包涵民族的人本身所具有的普遍的哲学主体性,更包涵了民族的人种所具有的独特的主体性。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作为主体地位所具有的性质和特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地位是在中华民族与自然斗争和与域外民族交往过程中实现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是在同域外国家或域外族群的比较中而存在,是在对域外国家或族群的战争、交流和影响中逐步形成和强化。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主体性在低谷中徘徊,达一百多年。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开始明显上升,民族主体性慢慢回归,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回归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随着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华民族主体性重新回归和振兴。中华民族历史悠悠五千年,民族主体性在历史长河中兴衰起伏,近代以来民族的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重要的因果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复兴和重建。

收稿日期:2020-12-24

作者简介:李长泰(1971—),男,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传统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

基金项目:2019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伦理向度实现路径研究”(2019YBZX116)。

一、中华民族主体性在古代的强大是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特征的中国历史呈现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中国在上世界上强盛不衰上千年,民族主体性得到充分展现,主体性意识强烈。中华民族主体性在古代比欧洲在上世界上更有影响力,中国制度先进,当时中国是封建社会,而欧洲是封建农奴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中国都比西方先进,凸显中华主体性特征。意大利人利玛窦将中国称为“中华帝国”,他说:“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熟悉。”^{[1]3}世界围绕中国而进行商业、文化和政治交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联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地位。

古代中国以深厚的精神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性强烈的思想根基。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使中华民族在人文素养方面具有深刻的内涵,在思维方法上具有主体的理性,培养了中华民族主体自尊、自强和自觉的精神意识。《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14}“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18}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凸显了民族作为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自觉性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特征的体现。人有主体性和能动性,这种主体性以内在的精神文化为根基,民族气质的彰显以内在的精神文化为总根源。中华民族的精神思想是世界的主体精神思想,这种精神主体性意识一直保持到清代后期。中国主体上对西方的科技文化有拒斥态度,封建帝王认为天朝大国是世界的主体国家。中国古代帝王主体性思想存在的根源在于其思想文化的根基,认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优于西方的宗教文化。“华夷之辨”凸显了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的强烈。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的特征,即每个民族都具有独立的个性和某一方面的先进性。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的特征。

古代中国以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性强烈的物质条件。古代中国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农业经济生产作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古代中国的经济一直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处于当时世界上经济强国的地位,这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确立奠定了强大的物质生存条件。从整体上来说,古代中国的物质生产方式明显比欧洲的畜牧生产方式先进,因此古代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对中国物质经济非常仰慕。历代统治者主体性意识突出,以天朝大国自居,建立了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庞大的朝贡体系,确立了国家的主体性地位,也使中华民族主体性一直保持强劲态势。中华民族先进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特征的历史呈现。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方式先进,物质生活得到有力保障,社会进步,民族强大,主体性得到凸显。

古代中国以政治思想制度一统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性强烈的政治保障。古代中国的封建统治以封建集权作为基本的国家管理制度,追求国家一统的政治治理方式。封建集权和国家一统使国家统治效率明显强化,国家的政治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家管理效能能够实现立竿见影,这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条件。由于政府具有强大的管理能力,思想发展、物质生产和社会管理达到统一,国家太平发展,使古代中国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为民族主体性的提升提供了政治保障条件。总体上看,古代中国的版图扩大是主要趋势,版图缩小不是主流。中国版图以扩大为主要态势说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以整体性为主要特征,分裂不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一统是先进的政治文明,促进了民族统一和团结,增加了民族的主体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特征在中国的历史呈现,以先进的文明促使人类文明的进步,增强主体性。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中华民族主体性自先民为了生存发展开始就在物质生产、精神生活、政治交流和民族交往中形成了国家和民族的强烈主体性性格,培养了民族主体性意识。国家强盛,文化深厚,民族自信,在上世界上成就了国家和民族的领先地位。古代中国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体现在独立性、自强的性、

整体性、先进性和优越性等方面,增强了民族自信心,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体性性格是在国内生存发展过程中培养形成的,是在与世界国家交往比较中发展壮大的,这种民族主体性性格为后来中华民族的觉醒、独立和复兴积淀了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近代困境是呼唤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意识的客观原因

中华民族传统的主体性特征一直保持到清代后期。鸦片战争前夕,西方许多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西方在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上有暂时的先进性。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西方却是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制度上的先进性。但是直到鸦片战争,清朝统治阶级还以天朝大国自居,骨子里还有强烈的主体性意识。经过鸦片战争,“中华帝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中国开始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最大屈辱。中华民族主体性在近代几乎丧失殆尽,民族失去了独立、尊严和完整,中华民族陷入了落后、自卑和怀疑的心理状态,民族主体性丧失达到百年。中华民族主体在近代的衰落和困境成为中国呼唤、萌生和接纳马克思主义意识的客观原因。

第一,明清时期理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思想的禁锢是中华民族主体性走向衰落的历史根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思想文化受到明清政治的钳制,缺乏生机与活力,不能激发人主体性进步的发展动力。中国在宋代以前思想文化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学术思想的氛围比较自由,但从明代开始,因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王朝限制了学术思想发展,清代这一思想桎梏进一步加强。自先秦至魏晋,百家争鸣和思想开放的学术风气促进了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但是宋代以后,由于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强化,学术思想受到禁锢,思想文化进入无活力的时期,其中统治者将理学思想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人的思想受到桎梏,人不能辩证地发展,人的主体性得不到彰显,思想不能创新。“一切与朱子理学相左的思想观点,均被视为异端邪说,学术争鸣的自由风气受到了严格限制。朱子理学自身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僵化,内在的学术生命接近窒息状态。”^{[3]436}明清时期,政治上对思想的限制更是对文化发展起到的灾难性的作用。明代开始大兴特务机构,清代大兴文字狱,对自由的学术风气进行打压,制造了很多学术冤案,限制了思想的发展,明清再没有出现有创见的新学。张岱年曾说:“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4]3}文化在动态中才能求得发展,在动态中才能实现发展和创新。文化思想是民族精神文化的支柱和纽带,是民族主体性能够彰显的深层根基,文化思想的禁锢必然带来思维创新的滞后,必然影响生产方式的革新与进步。中华民族主体性几千年长盛不衰,主体性意识与文化思想的创新紧密相连,但是到了元明清时期,文化发展的脚步开始明显滞后。文化思想的滞后和学术风气的败落,为中国遭受千年屈辱埋下了隐患。思想的禁锢必然使主体创新意识降低,导致人的主体性减弱。从深层次上说,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必然的,因为明清时期的文化禁锢与固步自封迟早要迟滞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的发展。思想的禁锢迟滞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导致中华民族主体创新性减弱,改变这一状况需要提升人的主体性意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正是提升人的主体创新性的思想,以辩证发展观和实践观提升人的主体性。

第二,明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落后于西方是中华民族主体性走向衰落的直接根源。文化思想的禁锢和意识形态的强化,必然带来中华民族主体性创新的减弱。明代之后,中国在科技上落后于西方的趋势逐渐显现,而西方则开启了近代科技的启蒙。中国一直处于农耕技术阶段,鸦片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科学技术全面落后于西方。西方运用先进的科技敲开了中国封建和封闭的大门,西方人运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发展武器反过来侵略中国,工业文明征服了农耕文明。明代往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得不到充分的尊重,学术自由的风气基本丧失,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丧失,科技进步的文化条件缺失,科技发展开始明显滞后于西方。而明清时期正是西方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人文理性得到进一步拓展。理性从宗教神学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迎来了辉煌的牛顿时代和伽利略时代。西方人文理性的发展给了科技发展最有力保障,人文理性是西方近代科技发展的关键条件。因此,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不能简单归

结为武器落后的失败,而是文化禁锢的结果。

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华民族原有的主体性受到重大打击,民族独立性、整体性、先进性和优越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失去民族自信,中国人陷入了自卑、落后和怀疑的心理状态,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突然丢失。冯友兰说:“这个战争给中国的打击太大了,使中国人不分上下都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5]329}中国从此衰落下来,中国遭受了千年以来的巨大屈辱,其时知识分子都在反思中国失败的原因。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科技的落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科技,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只能认识到科技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只能使这些人们觉醒到这一步,要进一步觉醒还需要第二次打击,那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之战。”^{[5]337}文化学者开始从深层次的角度去挖掘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民族主体性正是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主体性地位的减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式的主体性思想进行提升。

第三,文化革新和制度改进的滞后是中华民族主体性丧失的深层根源。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推行洋务运动,目的是富国强兵。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组建了北洋海军,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仅仅靠科技不能战胜西方列强,必须从“器”的层次上升到“道”的层次,必须进行政治制度的改进和文化的革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先进人物在中国遭受几次打击与屈辱之后在认识上终于有了长足的进步,文化革新的诉求逐渐上升到思维的层面。

近代中华民族处于主体性的弱势地位根源于文化思想没有发展变化,没有与时代相结合,没有在实践中变化发展,没有与时俱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和实践观。“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丧失了民族主体性,才使得中华民族不仅错过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最佳时机,而且使整个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6]虽然如此,但中华民族是不屈不挠的民族,在骨子里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革故鼎新的思维方法,中华民族需要重新获得民族独立、自尊和自信,重新找回民族主体性。因此,近代中国民族主体的弱势困境迫使中华民族重新思考、追寻和重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地位。近代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困境为中国呼唤、萌生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意识提供了有力的客观原因,对中华民族主体性弱势困境的改变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和实践观作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

三、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现代追寻是接纳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精神的动力源泉

自鸦片战争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主体性一直处于丧失和低落态势,直到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在中国传播,中华民族主体性才开始慢慢回归,局面逐渐改变。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有志之士在艰难和黑暗中苦苦追寻,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回归。中华民族主体性回归之路是思想革新之路,是文化转换之路。中华民族对主体性的追寻促使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意识上的觉醒,民族主体性追寻是接纳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精神的动力源泉。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前在学术上有“西学东渐”的过程,“西学东渐”主要由来中国的西方人和到西方学习或者经商的中国人将西方文化思想介绍到中国。“自明末利玛窦东来,介绍西洋文化于中国时始,反对之声即已四起”^{[7]104}。从总体上说,“西学东渐”对中国人而言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中华民族追寻主体性、回归主体性的一种途径。“西学东渐”是中华民族主体性追寻的第一步。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推动中国走向思想进步,回归民族主体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求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但一次次都失败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需要重新确立,此时的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回归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与部分统治者认识到“器”的重要性,主张学习西方的科

学技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志之士认识到“道”的重要性,主张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变革,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有助推作用。冯友兰说:“他们将西方来的新文化与中国固有的文化联系起来,使西方文化变成中国人可以理解的东西。他们以中国文化解释西方文化,或以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文化,有时候以中国文化的眼光批评西方文化,又有时候以西方文化的眼光批评中国文化。”^{[5]400}康有为的改革仍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价值取向。冯友兰说:“但在近代维新时期中,主要倾向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看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西方文化。”^{[5]401}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带来了思想文化革新的积极成果:戊戌变法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次大胆的革新尝试,促进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了文化革新意识;戊戌变法兼顾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以文化革新推动政治变革。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是中华民族主体性追求的又一次尝试,这一过程使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回归需要制度的革新,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追寻慢慢迈向文化革新的边缘。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继续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富强,提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辛亥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追寻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再一次尝试,主张通过改变旧制度回归中华民族的独立,但依然失败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回归依然前途坎坷。

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了灾难深渊,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似乎完全丧失。从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复辟帝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没有丧失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性格,他们奋发图强,希望革新技术、思想和制度,提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中华民族主体性追寻逐渐步入到文化革新的大道,文化思想不革新不能推翻封建主义而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水平逐渐提高了,认识到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提升应该从“器”的层面提升到“道”的层面,并最终认识到文化思想的革新是中国走向独立、富强和自由而实现民族主体性的根本,而文化思想的革新使命必须等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来完成,他们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文化思想的革新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回归带来了重要转机,开始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真正回归的征程。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回归的重要环节,为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创新了文化思想条件,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再次确立提供了文化氛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得到极大鼓舞,为五四运动爆发提供有充足的能量^{[8]450-458}。“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文化有重大的影响:点燃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多年积累下来的思想解放与文化转向的热情,提升了革新思想的觉悟和民族的主体性意识,加速了中国文化革新与转向的速度;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由中西文化之争转向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接受。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是文化转向意识和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提升的产物。中国内忧外患的困境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必然提升主体性意识,“‘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觉醒的新开端”^[9]。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下必然要发生的事件,是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历史规律发展的必然产物。五四运动爆发表明中华民族主体性回归的正式开始,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被中国无产阶级作为思想武器,中华民族主体性开始了回归的征程。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回归和振兴的伟大实践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提升了先进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思想主体性和人觉悟的主体性意识,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带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提升民族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中国化,中国逐渐富

起来了,中国实现独立、富强,中华民族主体性地位明显提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相结合,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中华民族主体性空前回归,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逐步提高和完全回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回归和振兴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回归和提升的过程。

第一,马克思主义提升和回归了中国人民“人”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以其哲学世界观为基础,主张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首先要对必然世界进行认识,然后实现人的身体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主张国家民主,建立公民的平等自由,在政治上实行民主,社会的主体是人民大众,个人主体是独立的和自由的,而不是少数人拥有独享自由的权力。

以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主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主体,提升了中国人作为人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文化上建立人民大众的文化,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人民的自由,“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10]568}获得生产资料是人实现自由的基本条件,有了物质保障才能实现人身自由。恩格斯说:“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0]566}人民是主体,主体是自由的人,这种自由是与社会的结合,在社会上发挥作用。“通过社会化大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10]563-564}人民的自由不仅仅是摆脱了物质上的束缚,权力地位上也得到相应改变,而且对社会有发挥作用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主张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由得到实现和主体作用得到发挥。中国共产党主张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人民大众的文化,提升了人的全方位的自由,全面提升人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整体上获得了作为人的独立性和尊严性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实现,增强了中国人民作为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人的主体性明显提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运用实践的观点改变自身受剥削、受奴役的命运,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和智慧,在实践中将人民的力量作为主体,放手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打败了帝国主义和消灭了封建主义,运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获得群众的支持,使人民具有创新性和能动性,这是人主体性的发挥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认识世界,实践改造世界,实践具有能动性和创新性,实践是人生活的本质,通过实践活动达到人的目的性活动。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领导中国人民改造旧社会,解放全中国,充分发挥了人的主体性作用,是中国人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彰显。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建立了人民大众的文化,提升了主体人的文化;文化是主体人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的文化,文化具有主体性。毛泽东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11]708}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发挥着主体作用。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广大人民群众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建立了人民大众的文化,文化凸显了人的主体性。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劳苦大众从未有过的事情,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利益得到空前改观,人民大众的文化建立起来,人民大众的文化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主体利益服务的主体性文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提升和回归了中华民族“种”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认为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马克思主义告诉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世界各民族的一员,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是独立的、自由的和平等的,中华民族要站立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中国

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回归到原有的平等地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中华民族回归到原有的主体性地位,提升和回归中华民族“种”的主体性。

中华民族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传统,这是民族的主体性意识和性格。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民族性格具有独立性,得到世界其他民族的认同和尊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实践,中华民族觉醒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前赴后继,南征北战,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华民族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民族获得了解放和独立,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重新确立。

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前一直是世界上强大的民族,主体性一直内存于民族精神之中。即使在中国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中国依然以强大而著称,如马可波罗称元代忽必烈所建之业为“伟业”^{[12][15]}。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一直是世界上强大的民族,在唐代,民族兴盛达到高峰,唐都长安成为世界的大都会。到了宋代,其生产力水平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尽管自宋代以后中国的强盛程度有所下降,但是中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强盛的时间很长,是其他民族绝无仅有的,这涵养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培养了民族自信心,主体性意识非常强。在骨子里中华民族不愿意受外国民族的统治和摆布,强大的民族主体性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心理、基本精神和原动力。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且逐渐实现中国化,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在文化思想上具有相通性,是文化的共同体,具有统一的民族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整体的核心价值理念相契合,殊途同归,坚持社会正义,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提升人民大众的政治地位,以人民的生活幸福为基本出发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解决人民大众现实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以民为本,注重物质生产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方式与中国共产党话语方式具有一致性,以大众语言让民众接纳,使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紧密相连,团结一致,形成了民族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统一性,主体性得到巩固和加强。

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平等观和民族平等观,提倡人的平等自由,世界无产者一律平等,主张阶级兄弟团结起来,推翻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同时强调世界各民族是平等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观提升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提升和再现了古代中国“国”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各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国的革命和实践,使很多国家获得独立和成立,提升了各个国家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了,马克思主义提升和再现了中国作为“国”的主体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提升了中国作为国家的主体性。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主体性再一次得到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促使中国很快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国家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主体性地位明显提高。同时中国主张“南南合作”,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有很高的威望,具有国家主体性。建国后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充分展示了国家主体性,抗美援朝取得了胜利,帮助越南赶走了法国和美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震惊了世界,中国主体性地位达到空前的高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升了中国作为国家的主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但新中国的成立并未能全面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人民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影响了国家在世界上的主体性地位,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在人民大众心中的地位。在思想上,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厘清了马克思的精髓和灵魂是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通过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澄清了社会主义也要发展的道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即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373}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富起来了,中国人民富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中国国家地位在世界国家中迅速上升。中国在上和联合国中有了发言权,有了中国声音,中国国家主体性进一步回归。

中国梦思想的提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提出重振了中国作为国家的主体性。在新时代,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的发展相结合,振兴了中国作为国家的主体性意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作为国家的主体性进一步得到振兴。国家建设蒸蒸日上,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成果形成的重要标志性会议,也标志中国主体性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自“十九大”开始,中国的国家主体性在上得到空前提高,国家软实力明显增强,国家在政治制度、人文科技、物质生活、社会幸福和精神信仰等各个方面都得到长足进步,国际威望和世界话语权进一步加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全面推进是中国作为国家主体性的最终回归。

五、新时代深化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的实践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伟大重建

基于中华民族主体性在中国古代的辉煌强大、在近代的减弱丧失以及在现当代的振兴和回归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复兴和重塑是历史动能的必然和民族性格发展的必然。这一必然规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主体性重建的过程中起着核心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复兴和重建的关键因素和精神动力。当今中国是世界大国,民族主体性空前提高,但是还没有回归到中国古代那种国家主体性地位的辉煌程度,必须继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相结合,推动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重建和完全实现。在新时代,必须深化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在中国的实践,推动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伟大重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重建是对原有古代中国中华民族主体性地位的重新建立,由原有中华民族主体性地位的超级强大性、独尊性和优越性重建为中华民族主体性地位的包容性、共存性和互尊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大国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的构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建构中国国家的主体性,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壮大综合国力,强有力地行使国家权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和行使公共权力的工具,对内实行阶级专政,对外抵御外来侵略和干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同时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和受尊重的,其他国家不能恃强凌弱,不搞霸权和强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中国必须重建国家的主体性,主要包括国家专政、国家统一和国力强大三个方面。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人民必须牢牢掌握国家专政的权力,对一切破坏国家发展的敌对分子和外来侵略、颠覆势力实行专政和回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坚不可摧,展现国家的主体性力量。同时,国家尽快实现完全统一,特别是两岸统一。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建构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推动民族团结和包容世界各民族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强调民族平等,主张将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所有民族不分大小和发展程度的高低,一律平等相待。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主张世界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友好,逐步实现

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华民族必须继续重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主要包括中华民族自身地位的独立平等、中华民族主体结构的团结强大和中华民族国际交往的包容发展三个方面。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与其他民族一样,在民族地位的自我认识上是独立的、平等的和自由的,反对其他民族搞种族歧视和民族霸权,反对进行民族先进与落后、优等与劣等的不公正区分。中华民族必须团结一致而保持整体性,反对其他民族的霸权主义和欺凌主义。中华民族必须依赖国家建设的推进加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和自由的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实力,达到世界强大民族的地位,以中华民族强大的主体性地位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重要地位。“坚定文化自信也需要广泛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文明成果,这有利于中国道路的创新与发展。在当今这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14]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复兴和重建必须包容其他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帮助其他民族摆脱他民族的欺压和欺凌,实现共同进步。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重建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与中华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综合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实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共同发展。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重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性,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以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中心思想,认为社会是人们交往关系的产物,在社会劳动实践中实现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主张文化多元共存,允许不同信仰和不同思想的文化存在发展,“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胞物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观念体现了和平、和谐的天下观,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社会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交互关系的产物,在劳动实践中实现社会进步达到共产主义理想。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重建必须以和谐社会为主体性观念,推动天下和平、社会和谐的建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高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精神价值世界,是真善美的艺术理想世界,它蕴含在各国文明思想之中。”^[15]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世界各国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而不同和兼收并蓄,实现天下大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重建是人类主体性的重建,中华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而不同、共生共赢的建设观念得到世界各民族的认同,是一种大同理想,因此重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重要环节。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建构人的主体性自由,推动民主法制建设。马克思主义强调人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人民在政治上拥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权利。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具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争取政治地位的平等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主张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在世界事务中拥有发言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重建必须重视国家政治生活的建设,以民主法制建设为重要内容,保障国内政治的公平正义和民主法制,在国际上推行民主法制的交往原则。政治是民心得失的关键,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政治上将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放在首位,以民主法制的原则行使国家权力,不损害人民的利益,行使权力有法制依据。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重建包括国内人民政治生活的推进和国际政治关系地位平等的维护,民族主体性的兴盛需要国际政治的支持,国内政治有民主和法制,国际政治又得到各国认同,民族的政治实力得到彰显,国家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就强大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民族政治地位的复兴,以主体性的自由民主构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必然有实际效果。

[参 考 文 献]

[1]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张立文,祁润兴. 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4] 张岱年,程宜山. 中国文化论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5]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 孙永建. 民族主体的缺失——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文化选择研究[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 [7] 全汉昇. 明末清初反对西洋文化的言论[M]//王元化. 释中国(第一卷).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 [8] 孟宪鸿.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 [9] 杨河.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觉醒的新开端[J]. 中国高等教育,2009(9).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 [12]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行记[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 [1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4] 邓纯东. 文化自信与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探讨[J]. 探索,2018(5).
- [15] 张立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N]. 光明日报,2017-11-16.

Marxism and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Li Changtai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rxism can be more useful to reconstruct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In ancient times, the powerful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was the showing of property of subjectivity of Marxism in Chinese history. Because of difficult position of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in modern times, China must call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ivity of Marxism. Searching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in modern times was source of motive force.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the great practice of return and promotion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The deepening practice of subjectivity of Marxism in China in new times i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unity of Marxism and reality of China pushes the returning, promo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forward. The great revival of Chinese in new times needs to keep using Marxism to reconstruct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Marxism; Chinese nation;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左福生]